

南”，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支持。1999年，在中国政府对“亚洲论坛”构想表示支持后，海南省派出4批省领导赴亚洲有关国家开展工作，并牵头筹备论坛专家学者会议和筹委会会议，参与草拟创建博鳌亚洲论坛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与相关部委和智库一道对论坛的宗旨、组织架构和法律地位等基本要素进行概念设计，为博鳌亚洲论坛的创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础性研究，为论坛搭建了基本组织架构，确定了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

经过多方努力，博鳌亚洲论坛于2001年正式成立，海南省服务论坛年会机制的探索之路也由此逐步开启。万事开头难，随后于2002年召开的论坛首届年会的服务保障工作陷入了困境。论坛成立之后，各方关注度很高，中外代表参会十分踊跃，论坛总共邀请了2000多位代表，加上随行工作人员参会达到3000多人，但当时博鳌的最大接待能力不足1000人，加上刚成立的论坛秘书处和海南省之间的配合还在不断摸索、磨合之中，大家对举办如此大规模、高层次会议的困难估计严重不足，接待规模和接待能力极不匹配，给服务保障工作带来了诸多问题和重大困难。当时很多与会代表到博鳌后没地方住，不少代表只能住到100多公里之外的海口，开幕式当天早上6点就要乘坐大巴车赶赴博鳌，可博鳌的主会场最多只能容纳400人，许多一大早赶来的代表进不了主会场，只能在酒店里看电视直播。不科学、不合理的安排也使得许多代表抱怨不断。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一幕幕，我和我的同事

们觉得心里十分内疚、十分不安，大家热情高涨地支持我们办论坛，却因我们的工作没到位，不能获得良好的参会体验。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当时出席年会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还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表示歉意。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心酸不已、歉意涌流。

有了2002年的惨痛教训和宝贵经验，我们做工作便更加有的放矢了。省领导给省外办下了军令状，无论如何一定要在第二届年会打个翻身仗。服务保障好参会规模如此庞大的博鳌亚洲论坛，对全省上下的动员组织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动态管控能力、服务保障经验均是极为严酷、巨大的挑战和检验，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管用权威的论坛年会服务保障机制。首先，省外办从办领导班子到各处室制订了层层负责制，省外办主任向省长负责，外办副主任及各级处长向外办主任负责。第二，建立了有效的内部协调和沟通机制。海南在与参加论坛年会筹备工作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论坛秘书处做好协调和沟通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与会接待规模的有效控制。当时，省外办牵头开发了会务注册管理系统，所有报名与会代表都须通过该系统登记注册，这样一来，我们就摸清了底数，掌握了主动权。在总结前一年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工作经验得失基础上，经过各方的通力协作，海南成功在第二届年会上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与会各方对论坛评价都非常积极，中外媒体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通过不断实践、摸索和总结，海南逐渐形成了一套有自身特色、逐步与国际通行规则

接轨的国际会议服务保障机制。在这套服务保障机制的支撑下，海南不遗余力地持续提高论坛服务保障水准，并把探索保障论坛的制度创新作为新的努力方向。

宝剑锋从磨砺出 (2005年—2012年) ——机制的完善与进步

经过最初几届论坛年会的摸索和实践，2005年，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海南省服务保障工作方案》，我省首次创建了“博鳌亚洲论坛服务保障工作长效机制”，为之后论坛年会的服务保障工作搭建了“四梁八柱”，完善了顶层设计。省外办作为领导小组的总牵头部门，依托论坛的服务保障长效机制，与外交部、公安部、论坛秘书处、中远集团以及省内各部门进行了充分、及时、有效的沟通对接，实现了服务保障的无缝衔接。从经验不足到高效有序组织服务保障论坛工作，海南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主要还得益于我省在实践中创建了“战时动员机制”“临时授权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几个全新的工作制度，这些工作制度成功地破除了有关厅局处室界限障碍，打破了公务员级别高低界线，把“通”和“堵”的问题彻底解决了，真正实现了岗位负责制，切实做到了责权统一。比如遇到车辆事故、医疗救护等各种突发事件，无需层层请示，责任人可直接调度、第一时间处置。这些好经验、新制度是我省参与服务保障一线工作者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发展和完善的，实践证明它